

■ 纪 念

火热的耕耘者

——悼念刘茵师姐

□ 雷 达

对刘茵的猝然去世我一直难以释怀。2月28日下午,手机显示阎纲兄曾打来过电话——以前他从未与我用手机联系过,我顿感一定有事,赶紧打过去。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刘茵去世了!我惊呆了,这怎么可能,什么病呀?阎纲略作解释,我依然不解。因为我知道,除了前年腿摔伤已痊愈、眼底黄斑使视力骤降之外,刘茵什么病也没有,体检结果出奇的正常,是标准的健康老人,加以她开朗热情的性格,我常想,她至少能活到90岁以上。可是,谁能想得到呢。

刘茵、阎纲、谢永旺、周明和我,同毕业于兰州大学。他们几位比我要好高多个年级,并未同时在校过,我称为师兄、师姐。多年来,他们给我许多帮助,我对他们也非常尊重。新世纪之初,盘点“百年甘肃”时,有人把阎、谢、周还有我,并称为“兰大文坛四才子”,写成文章,在甘肃广为传扬。刘茵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还在北京某中学教过书,上世纪70年代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先是在《当代》,后来是《中华文学选刊》。没想到,这一调,给中国文学界调入了一位优秀的编辑,给中国报告文学界输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耕耘者、播火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刘茵在发现人才、培养作者、发现好作品、推动报告文学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最近路遥的作品很火,是文坛热门话题之一。其实,路遥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责任编辑正是刘茵。路遥这部稿子投到全国许多刊物,全部被退稿,连连受挫,眼看陈忠实的《信任》、贾平凹的《满月儿》和京夫的《手杖》都获了短篇小说奖,路遥由焦虑而有些灰心,说,若这个中篇最后投《当代》也不用,“稿子不必寄回,一烧了之”。然而,生活中“惊心动魄”的喜事说来也会来。是刘茵打电话问路遥的上级董理:“秦兆阳主编看过稿子了,准备采用,但有些意见。路遥可否来京改稿?”路遥得知后欣喜若狂,给刘茵写了8页长信陈述创作动因。刘茵回忆道:“路遥见到秦兆阳时非常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路遥根据秦兆阳、孟伟哉、刘茵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1982年这篇小说获得了首

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记得发奖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当天下午,获奖者、编辑、评论家座谈,我和刘茵都在场。北京的作家们个个谈笑风生,外省作家却都拘谨不语,路遥尤其,憋红了脸,像个怪人,使那天的气氛格外凝重、严肃。此时不知是路遥自己还是别人,弄翻了茶杯,嘭的一声砸在地上发出巨响,会场忽然静寂,有人冒了一句“惊心动魄的一幕呀”,全场哄然大笑,联系到路遥的矜持和他获奖作品的名字,大家就笑得更凶了,气氛才转了过来。

后来路遥写道,在中国老一辈作家中,他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秦兆阳,称他们为自己的文学“教父”。路遥后来又有获奖的中篇《人生》,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平凡的世界》,成就赫然。但我在想,假若路遥最初没有碰上刘茵这样热心的成人之美的编辑,假若《惊心动魄的一幕》再一次遭遇退稿,路遥还会成为后来的路遥吗?实在难说。何为“机遇”?细想其实就是“人遇”或者“遇人”——人与人之间所充满的偶然性,在不断地改写着一个人的一生。

刘茵是报告文学领域里勤恳的耕耘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热情似火的耕耘者。她腿勤、嘴勤、手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使她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好的题材线索、有潜力的作者,一经发现,她即刻行动,捷足先登。根本的动力还是她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和奉献精神。有多少优秀作品是经她编辑后走向中国文坛的?我没统计过,仅凭稀薄的印象,赵瑜的《强国梦》、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乔迈的《希望在燃烧》、李鸣生的《飞越太空港》《走出地球村》、黄传会的《中国山村教师》,还有卢跃刚的好几部作品等等,皆出其手。从作家到将军的刘亚洲,也曾是当年的新锐作者,刘茵多次谈过与他的交往,并责编过其稿子。具体是《陈胜》还是《恶魔导演的战争》,我记不得了。

不过,现在说起刘茵,大都强调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搞编辑工作,其实忽略了另一面:她更突出的特点是有政治热情,关心时事,在拨乱反正和反对极左方面,有鲜明的立场和尖锐的见解。编辑出版《中国的眸子》的过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她特意送

了我一本。

她与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是好朋友,大多有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情谊。她有一颗火热的心,有激情,乐于助人。人们半开玩笑地说,只要刘茵要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她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为作者。有一年,她向我介绍了一位青年才俊,并将其简历、文章等材料送过来,要我推荐他进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看了材料,我很满意,把材料交到人事部。但我人微言轻,进个人到北京谈何容易,因为户口等原因,没调成。但她一直在追问,使我有压力。《敦煌之恋》的作者王家达是当时甘肃省作协主席,我的同班同学。王要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我不写。没想到他“告状”到责编刘茵那里,她立刻抄起电话找我,要我必须写,说了一大堆理由,我还是写了。后来《敦煌之恋》获了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我这篇序好像被用得很广泛。刘茵虽已退休多年,仍大量看稿,关心文坛,直到去年,她还把厚夫的《路遥传》推荐给人文社的编辑脚印,近日出版了。厚夫感谢不尽。

有一年,某报要报道刘茵,原来的大题目是“报告文学之母”,且马上就要付印,她觉得不妥,犹豫着,征求我的意见。虽然我也理解,但我一向不大主张用“之父”、“之母”、“之祖”的提法,好像夸一个人总让他当个长辈,压人一头,才叫荣誉。我也不喜欢“最后一个”什么的,好像时间到他那儿就停顿了。我直率地谈了些看法。她完全同意,立即让报纸撤换了版。

刘茵长期从事辛劳的编辑工作,个人情感生活又无挫折,却能把全部热情投入事业之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北某出版社出她的个人作品及评论文章集子,不知为何,她执意要我写序,我就写了。这次阎纲兄还说,你序中的一句话是对刘茵最好的评价。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句话。我倒是读到书中刘茵自己在散文《拣石子》中写的:“性格坚实的小石子,不甘在茫茫大海中沉没,顽强地漂荡于海岸金沙。”忽然感动,心想,这何尝不是她坚韧、顽强的生活信念的剖露呢!

刘茵大姐走了。

以往每次通电话,刘茵大姐总是话语滔滔,而且聊着聊着,话题便会不知不觉地拐到报告文学上来,或是读到了一篇好作品,或是发现了一位新作者,或是对报告文学学会工作的建议等等。有时,突然接到她的电话,没有其他事,就告诉我刚刚读了一篇报告文学,特别精彩。惟独春节前的两次通话,她却是情绪低落,问她怎么啦,她有些支吾地说最近一直睡不好觉,还说“(何)西来怎么说走就走了,人的生命也太脆弱了……”我劝慰她一定要去医院治疗,还想过了节去看看她,没料想她竟然会这么突然就走了。

我与刘茵大姐可以说是因为报告文学而认识,由于报告文学而结缘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刘茵大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做编辑,那时候,我们还不上课。我将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书稿送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正好是她。一个星期后,接到她的电话,让我去趟编辑部。一见面,她便热情地说:“传会,你抓到了一重大题材。希望工程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这部作品很有分量,我们准备在刊物上先刊发几万字,然后,出版社再出书。”

《托起明天的太阳》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冰心先生在《人民日报》写了《请读〈希望工程纪实〉》的评介文章。刘茵大姐又介绍我登门去向冰心先生请教。先生见我穿着海军服,说:“你是海军,我父亲也是海军。他为了北洋海军的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冰心先生对海军发展的关注,令我感动;她对文学独到的见解,让我终生受益。

此后,我几部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山村教师》《忧患八千万》《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均得到刘茵大姐的指教。我每选中一个题材,都喜欢先征求她的意见。每回,她都会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感觉和建议。

2000年,我与几位作家合作创作一部反映上海当代青年风貌的报告文学,刘茵大姐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她和我们一起跑到上海。白天与大家一起采访,晚上与大家一起研究章布局,提建议,出点子,非常投入。她说:“看到你们几位海军作家这么团结,齐心协力,我很高兴。文学是一种个体劳动,但一些重大的报告文学选题,是可以搞团队协作的。”从她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文学编辑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前年,我领受了创作有关航空英雄罗阳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刘茵大姐很支持,她说:“罗阳是当代知

报告文学是她永远的牵挂

□ 黄传会

识分子的典范,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罗阳这样的人。这样的典型值得作家去写。”初稿出来后,我打印了两份分别送给刘茵大姐和《十月》杂志原主编田珍颖大姐,请她们提提意见。半个月后,在她们家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两位大姐给我谈阅读意见,从全书主旨到章节结构,从人物言行到每个细节,她们谈得很细,也谈得很细。中午,我仅仅请她们吃了顿简单的快餐。我有些愧然地说:“一顿快餐,不成敬意啊!”她俩却笑着说:“只要你写了好作品,吃什么都高兴!”过了两天,刘茵大姐打来电话:“传会,我又把书稿翻了翻,觉得罗阳这个人物身上的细节还少了些,你应该再下工夫去挖掘。”当我流露出斯人已去、采访困难的情绪时,她鼓励说:“你还是有这个潜力的。”我又采访了一番,力图使人物更真实、更丰满。后来,《国家的儿子》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见面时,她比自己得了奖还高兴地说:“祝贺啊!不过,你还得继续努力哟!”

像我这样得到过刘茵大姐扶持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点出一二十位。我没有统计刘茵大姐编辑过多少报告文学作品,但我知道,有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篇章,都凝聚着她的编辑心血。

她的生命里充满着报告文学的基因,她的血液中流淌着报告文学的情怀,她对报告文学的前景一直看好,她为报告文学四处鼓与呼。

她时时都在关注着报告文学创作,读的作品多,联系的作家也多,因此,她对报告文学的诸多见地一针见血,发人深思。

她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说报告文学如果没有“文学性”,又怎能称之为报告文学?她说报告文学应该学习、借鉴、吸收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的手法与技巧,要把报告文学写得像小说一样有悬念,一样吸引读者。她情真意切地说:“现在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读者不满意,就是因为‘报告’有余,‘文学’不足。作家们应该在‘文学’上下大工夫。”

她对近些年来动辄二三十万、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报告文学横空出世、长风盛行感到忧虑。她认为无论从报告文学的质量计,还是为忙里偷闲的读者计,报告文学必须从长风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该长则长,当短则短。不以长短论英雄,无论是全景式厚重的长篇还是“轻骑兵”式的短制,都应该精益求精,写得精些再精些,短些再短些!

刘茵大姐走了,带着她对报告文学的不尽牵挂走了,报告文学园林里失去了一位辛勤的园丁。我们只有写出更好的作品,才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 讲 述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 林绍纲

巴金是我最崇敬的长辈和老师。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家》《春》《秋》等小说,粗略地懂得他为反封建压迫、揭露旧社会罪恶而“控诉”的精神。而真正结识、稍微读懂巴老一些,则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了。

那时,我开始参与文学外事活动。巴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是作协外事部门工作人员,巴老在北京、上海、杭州参加活动,我多次在他身旁,聆听他与来自亚、非、欧等不同地区的作家、学者的谈话。他以发自肺腑、字字珠玑的话语,打动了众多的外国宾客。比如有一次,回答南斯拉夫作家提问的有关东西方文化特色的问题,巴老说:“我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民变得善良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写作的。所以,凡是好的、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就都吸收它。但不知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写文章是用人物的命运、思想、感情去影响人、感动人,而不是用文学技巧。我主张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要靠外加技巧来吸引人。”外宾又提出:“听说您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知您作何感想?”巴老说:“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少。1980年我在访问法国时,法国朋友中不少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不以为可以自己可以得到这项奖。我认为对作家的最大荣誉是读者们的喜爱。朋友们多次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是这么回答的。”最本色,也最虔诚的回答,令外宾露出了钦佩的笑容。

巴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面闪光的旗帜。他常说:“我期待文学成为加强多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

1993年7月,正是炎炎酷暑,我去上海,在李小林和徐铃两位老友安排下,病中的巴老会见了。这是我离开中国作协工作岗位后,首次看望他老人家,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阳光照耀下的书房走廊中,巴老热情而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低缓地间起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的近况。听完我的诉说,又问起“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情况……幸好我在离京前,从现代文学馆筹建负责人舒乙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巴老听完我的转述汇报,清瘦的面颊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在我离开时,他执意要送我到客厅门口,我搀扶着巴老缓缓走向门前,徐铃用相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

就在离开之际,徐铃建议我去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休息一下,并说:“这同你陪外宾参观访问座谈不同,你可以自己细细体会一下……”

杭州创作之家是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编辑家写作和休养的处所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

的20多年里,这里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作家,他们在此留下了亲切的心声。巴老就写了两幅,其中一幅是:“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一九九零年十月十四日”。这幅题辞,如今已被镌刻在一块两米高的碑石上,竖在庭院中。第二幅题辞是:“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提起这幅题辞,那要追溯到1991年5月,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时,巴老应大会邀请,在杭州创作之家为大会题写了这句名言。

巴老提倡讲真话由来已久,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反对强权专制。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强调“文学艺术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即使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他依然大声疾呼作家“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要有讲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巴老从中外文学界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并树立了一个信念: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可以说,巴老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

晚年的巴老痛感几十年来社会的积弊,严重影响和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精神文明的提升,所以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讲真话。在文集《随想录》中,就有7篇关于“讲真话”的文章。巴老写到:“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

在那样的政治社会情况下,凡是说了一点真话就有可能遭到迫害,所以,巴老从这样的历史中总结:“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不容易,不说假话更难。”

后来,巴老更加大声疾呼:“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鼓励老朋友写真话、讲真话。

为了缅怀、纪念巴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题词,巴金研究会于2014年3月在杭州创作之家庭院中,竖立一块高两米的碑石。注释如下:

一九九一年五月应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请,巴金先生于杭州创作之家为大会题写了这句话,它不仅凝结了巴金先生毕生的创作经验,寄予了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殷切希望,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继往开来的至理名言。



生活的琴弦

王新瑛/图文

立冬后的日子,北方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辛劳了一年的农人们,一边趁着这段时间休整,一边归置生活所需。在陇南,人们开始准备制作手工挂面。过去,由于经济困顿、生活艰难,在康县、成县、西和、徽县等地的农村,人们会在春节之前制作手工挂面,以满足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需要。

每年的隆冬季节,有点余粮的人家开始选麦子、淘洗、晾晒、磨面,把最好的麦子磨成面粉,挂成挂面。正月初二开始,人们背上一背篓挂面走村串巷,甚至翻山越岭去给亲戚朋友拜年,人与人千丝万缕的情感也被一把把、一根根挂面连接起来。

这期间,平时难得走动的亲戚得以围着炉火嘘长问短,问候老人,闲聊收成,或者谈论过去的一年里家里是否添了进口,是否盖了新房……清冷的日子,在一把把挂面的联结下,家家户户屋脊上飘着袅袅

■ 行 走

大美当城

□ 刘向阳

展现给我们的不止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更多的是一个整洁安宁、祥和幸福的庭院;也不止是宽阔大气、难望首尾的柏油马路,更多的是一排排杨柳蔽日,小溪相伴的乡道;更不止是车水马龙、一派喧嚣的热烈,更多的是静谧悠然、犬吠鸡鸣的清新。

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一个有着7000人口的大村,传承千年的淳朴民风在这里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他们认为种地是自己的本分,没有了地,就失去了根。于是,他们仍然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伺候他们的庄稼和果园。他们相信科学,知道农药、化肥会让粮食增产,果蔬鲜艳,可他们仍然沿用古老农耕时代的施用农家肥和人工捕捉害虫的作业术。事实证明,当城人是对的,当城的水果和蔬菜被人称为“放心果”、“放心菜”。城里人会成群结队,蜂拥而至,争相采摘,大快朵颐。憨厚的当城人对谁都欢迎,要多少就给多少,价格好商量。当然,谁也不会让老实

当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缩影,

炊烟,阡陌小路上多了人们走动的身影。

早晨,阳光照进农家院落,天气晴好,没有风,这样的天气最适宜挂挂面。将面窖里的小面小心翼翼地挪到院子里,踩上凳子,把竹棍一端插在高高的架子上,凳子上的人从上面用两根长点儿的竹棍划开面,让面条均匀受力、互不粘连。安静的农家小院内,成排的挂面细细的、长长的,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若有微风掠过,便会轻轻摆动,宛如拨动的琴弦。

到了下午,架子上的挂面已晒干,把它们轻轻卸下,按照需要的规格裁切,绑把儿,再缠上麻线。到此,手工挂面的制作程序才算完成。很久以前,一把手工挂面,便是拜年的最好礼品,胜过如今任何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厚道的当城人吃亏。“以心换心,黄土成金”的理儿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体现。

当城,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却没有像相隔不足10公里的杨柳青那样,成为闻名遐迩的名镇,更没有星点儿像只有600年历史的天津市区那样的大都市风采。时至今日,非但没有发展,反倒由城变成了村。是老天不眷顾这片风水宝地?是历史辜负了这座古老的城郭?还是祖祖辈辈的当城人不思进取呢?在我还来不及扼腕惋惜之时,当城让我寻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时候不到”。当城人一直处于蓄势待发的姿态,犹如一座岩浆滚动的火山,犹如一艘帆帆高扬的大船,一旦时机成熟,便将爆发出不可估计的当量,便将驶出一日千里的速度。

短暂的两天采风结束了,在乘上返程的大巴时,我是多么的不舍得。我眷恋坐在铺着苇席的土炕上,啃着熟棒子,品尝着茄子拌土豆、小鱼贴饼子的香甜;我眷恋爬满牵牛花的篱笆上雄鸡的啼鸣,鸡婆婆领着一群绒球般的小鸡雏咯咯觅食的安祥;我眷恋子牙河口中站在小船之上的放鹅人,挥舞竹篙,与上百只白鹅共舞的优雅;我眷恋在百亩果园深处的游乐场,一边咀嚼着嘎嘣脆的苹果,一边荡着秋千的悠闲;我眷恋置身茫茫麦海之中,耳听麦浪翻滚之声,眼望麦穗与阳光互映成辉的精彩……大美当城!